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研究评述^{*}

李未无

内容提要: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实质上是对出口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这种研究视角对于理解一国出口增长的质量、平稳性和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经济学家越发重视该研究课题,展开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归纳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1)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各种定义和测度方法;(2)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影响因素;(3)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对出口增长、贸易条件、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关键词: 出口广度 出口深度 贸易成本

一、引言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是目前国际贸易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前沿热点,其渊源可追溯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把关注点放在新产品和高质量产品的创造以及这些产品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上。

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演变来看,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关注现有产品的出口扩张(也就是出口深度)。新国际贸易理论强调产品种类多样性对国际贸易的产生和贸易利得的重要性,但该理论较少涉及出口企业的差异问题。最新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也称新新贸易理论)将注意力放在企业的生产率差异上。该理论不但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一般贸易模式和生产率水平,还指出一国出口增长是通过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共同实现的,而且分析了决定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之因素。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实质上是对出口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这种研究视角对于理解一国出口增长的质量、平稳性及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定义和测度方法

(一)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定义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和数据可得性,人们给出了各种定义。本文从产品、厂商和国家层面将这些定义归纳为偏微观和偏宏观等两类。

第一类定义偏微观,又可细分为产品视角和厂商视角,这类定义最具普遍性,也最符合人们的直觉。基于高度细分的产品数据,Hummels和Klenow(2005)认为出口广度是指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而出口深度是指现有各种出口产品的贸易大小。Besedes et al.(2007)也主要从产品视角出发,认为出口广度是指建立起一种新的贸易关系。具体包括三种情况:第一,一国出口以往没有出口过的产品;第二,一国将产品出口到以往没有出口关系的国家;第三,一国出口以往出口过的产品到以往没有出口过的国家。而出口深度是指一国已经存在的贸易关系之强度,这种强度可细分为生存度和深化度,前者是指已有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长度,后者是指已有贸易关系的发展能力。

Pacheco和Pierola(2008)主要基于地理因素,结合产品视角加以定义。他们将出口深度定义为过去已经出口的产品继续出口到过去已经出口过的市场(旧产品旧市场),出口广度定义为过去没有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新市场(新产品到新市场)、过去已经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新市场(旧产品到新市场)和过去没有出口过的产品出口到旧市场(新产品到旧市场)。

一些经济学家则基于厂商视角加以定义。比如,Bernard et al.(2009)根据厂商的贸易数据,将出口广度定义为由于厂商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而引致的贸易变化,出口深度是指现有出口厂商贸易额之

^{*}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09YJA790051)资助。

大小。Lawless(2008)与Bernard et al.(2009)的定义较为接近,将出口广度定义为出口商的数量,出口深度定义为单个出口商的平均出口额。

第二类定义偏宏观,主要基于国家层面。Felbemayr和Kohler(2006)将出口广度定义为一国与以往没有出口关系的国家建立出口联系或者一国与已有出口关系的国家剪断出口联系,出口深度是指已经存在贸易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出口大小。

许斌(2008)则认为出口广度是指用世界其他国家出口价格衡量的某个国家出口商品总值占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总值的比重,反映了该国出口商品种类的变化,出口深度是指某个国家出口的商品总值占世界其他国家在这些商品上出口总值的比重。

(二)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测度方法

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测度方法也没有统一的模式,学者们主要基于特定问题、研究目的和数据可得性构建和(或)选择适宜之方法。目前主要有三种测度方法。

一是直接计算法。该方法主要利用细分的出口产品数据直接计算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

Feenstra(1994, 1999)构建了时间维度的出口产品种类变动指数或出口广度指数,该指数可以反映产品层面上的出口广度在出口增长中的重要性。为了获得两国在产品种类上的差异性,Feenstra(2003)还构建了横截面上的出口广度指数。Hummels & Klenow(2005)借鉴Feenstra的方法,不但直接计算横截面上的出口广度指数和出口深度指数,还计算构成出口深度的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

二是参数推断法。这种方法首先基于理论模型推出计量模型,进而估计相关参数大致获得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之大小。

Kanacs(2007)基于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框架,从理论上推出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函数,然后通过计量模型获得所需的参数值,最后不但算出逐年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而且还模拟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变动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之影响。Helpman(2008)则把异质性企业模型和引力贸易模型结合,运用参数法、半参数法和非参数法等算出企业层面上的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

三是出口增长分解法。该方法是指将出口增长分解为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每一部分还可再细分。另外,既可按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加以分解,也可按产品、企业和国家层面数据进行分解。

三、影响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各种因素

(一) 贸易成本视角

从贸易成本角度探讨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决定因素主要围绕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展开,该模型从理论上给出贸易成本影响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一般机制。Melitz(2003)指出固定贸易成本和可变贸易成本对出口广度具有不利影响,对出口深度的影响却不明确。

一些经济学家直接利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之结论展开经验研究。Eaton et al.(2004)利用法国企业数据,发现贸易成本对出口广度具有显著的影响。Pacheco et al.(2008)基于发展中国家数据,指出贸易成本下降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产生积极影响。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框架下,Kanacs(2007)不仅从理论上分析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与出口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而且分别考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东南欧国家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不同影响。Kanacs发现,东南欧实施自由化贸易政策主要对出口广度而非出口深度产生较大的积极影响。

距离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一直被经济学家所重视,特别是在能源价格日趋上涨之时。一些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将运输成本设定为可变贸易成本,因此距离成为可变贸易成本的决定因素。Lawless(2008)发现距离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具有不利影响,但从系数之大小和统计显著性来看,距离对出口广度的影响尤为突出。Felbemayr & Kohler(2006)基于包含“角点解”的贸易引力模型,发现两国距离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具有显著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不断减弱。

由于从贸易成本视角定量分析一国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之决定因素往往需要全面而详尽的企业层面贸易数据,而发达国家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更为完善,因此经验研究大多围绕发达国家展开。对于缺乏企业贸易数据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采用参数法,该方法之结果较为宏观和粗略。因此,发展中国家今后应努力完善企业层面的贸易统计数据,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二) 贸易自由化视角

随着贸易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人们越发关注其对一国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之影响。由于贸易自由化往往与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密

切相关,深入探讨贸易自由化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影响对于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评估和修正具有重要意义。与贸易成本视角相比,基于贸易自由化的文献大多以经验研究为主。

墨西哥于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后,不断降低关税水平。另外,中国为了加入WTO,在2001年以前不断下调关税。Feenstra & Kee (2007)比较研究1990-2001年间中墨两国贸易自由化进程对两国出口广度的影响。他们发现墨西哥的出口广度一直在增长,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后尤为明显。中国的出口广度也不断增长,但加入WTO前后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Debaere et al. (2007)发现关税对出口广度的影响尽管显著但较小,主要原因是关税消减仅是二战后贸易自由化浪潮的一个方面,贸易自由化涵盖的范围远大于关税领域。他们认为出口国宏观经济条件变化、技术创新和扩散可能是影响出口广度的主要因素。

Ingo Borchert (2008)详细研究了市场准入条件与出口参与模式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生产的国际片段化或垂直专门化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广度扩张的主要原因。

Felbermayr & Kohler (2009)探讨加入WTO是否明显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以往研究该问题的文献仅注意到已存在贸易往来的双边国家,忽视了加入WTO可能引致以往没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建立起贸易联系,后者实际上是出口广度扩张。通过把具有“零贸易”的双边国家也纳入引力模型,结果发现尽管加入WTO增加了相关国家之间产生贸易联系的可能性(也即增加了出口广度),但是没有发现出口广度在平均意义上对WTO的贸易创造潜力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影响。

定量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一国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影响一般利用产品层面贸易数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类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都较为完善,因此经验研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已有研究大多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于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具有积极影响,但出口广度的扩张效果更加显著。

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之内在机制,大多数文献认为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一国的固定贸易成本和(或)可变贸易成本,从而创造出新的盈利机会,生产效率较高的厂商开始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效率较低的厂商则退出,现有生产效率较高的出口厂商往往会增加出口。结果是该国出口

增长沿着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同时扩张,当然在这两个方向上的扩张程度往往存在一定差异。

(三) 市场结构视角

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Krugman和Helpman的努力下,有关市场结构和贸易模式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已较为完善,但市场结构对出口产品多样性或出口广度的影响仍然缺乏严格的经验分析,主要原因是很难定量测度出口产品的多样性。直到1994年,Feenstra才率先提出一种可行且精确的测度出口产品多样性的新方法。

Feenstra et al. (1999)利用该方法,实证检验了市场结构对出口广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台湾地区对美出口广度大于韩国,特别是在最终产品上面。显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要素禀赋基本类似,但是它们在出口广度上差异较大,表明市场结构可能是影响一国或地区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令人遗憾的是,有关市场结构影响出口产品多样性和出口产品质量的经验研究文献较为稀缺,还需更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展开探索,给出更多的经验证据。

(四) 需求视角

关于影响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因素的最新研究成果主要围绕需求面展开,具体包括目的国市场规模(即需求大小)和需求结构两方面。

Bernasconi (2009)基于Linder理论假设推出相关计量模型,获得了较强的支持Linder提出的需求面效应之经验证据。他发现两国人均收入越接近以及国内收入分配越不平均,产品层面上的出口广度越大。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需求结构越相似,相互贸易的概率越高,也就是说国家层面上的出口广度越高。通过把异质性消费行为引入Eaton & Kortum (2002)的模型,Hepenstick (2009)解释了双边贸易伙伴的人均收入越高,贸易伙伴之间的相互出口广度也越高的原因。他认为核心机制在于贸易伙伴人均收入越高,其国民消费的产品种类越多,这样一来进口产品种类也会增加,即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广度会增加。

(五) 其他视角

金融视角。Melitz (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主要是指不同企业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或异质性。实际上不同企业在信贷约束上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通过构建信贷约束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Manova (2006)发现,在金融脆弱性部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出口广度往往也更高,而出口深度较少进行调整。另外,金融越发达国家的贸易伙伴越

多,出口广度越大。

外部冲击视角。Bernard et al. (2009) 探讨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对美国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美国对亚洲的出口广度大幅下降,而且美国对亚洲的出口深度下滑幅度也高于没有遭受危机的其他国家。

垂直专业化视角。人们发现降低关税等贸易自由化措施对于提升出口广度的作用有限,于是推测产业(或部门)和国家之特点对于出口广度扩张具有重大影响。Peter & Mostahari (2009) 发现需要中间品较多的产业或部门对贸易阻力(如关税和距离等)的变动更加敏感。

四、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对生产率、出口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 对生产率的影响

产品种类扩大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从微观视角深刻理解跨国或跨时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由于测度产品种类多样性所需的细分数据很难获取,再加之测度方法本身也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有关产品种类多样性影响生产率的实证检验一直较为稀缺。

Feenstra et al. (1999) 首先尝试直接检验产品种类扩大是否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他发现中国台湾16个部门中有9个部门的出口广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

利用1982-1997年34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Feenstra et al. (2008) 发现,尽管出口广度仅仅解释2%的国家间生产率差异,但是却解释了13%的国家内部生产率差异。这意味着如果一国全部产业的出口广度平均增长10%,将导致该国生产率平均增长1.3%。

另外,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得来自根据比较优势的专业化分工。现代贸易理论指出生产者规模经济和消费者可获得产品种类多样化也是贸易利得之源泉。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则给出了新的贸易利得之源泉。随着低生产率企业被挤出出口市场并减少生产,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并扩张生产,这种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显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由此可见,出口广度是一国生产率进步的重要途径。

(二) 对出口增长的影响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着力关注产业内贸易,指出

产品多样性是产业内贸易之基础,一国出口产品种类越多,该国出口增长往往也越快。经济学家针对这一贸易思想进行大量的实证检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验研究没有直接测度产品多样性,只是使用诸如研发支出、专利数和利润率等作为间接测度产品种类多样性的代理指标。由于这些代理指标较为粗糙和杂乱,因而有关产品种类多样性影响出口贸易的实证结论往往缺乏说服力和稳健性。

Funke et al. (2001) 基于 Krugman (1979, 1989) 的模型,从理论上推出一国出口产品种类越丰富,其出口量越大。利用东亚和OECD国家的细分出口数据,算出测度出口产品种类多样性的指标(即出口广度),对该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出口广度或出口产品多样性有助于解释出口增长。

Besedes et al. (2006) 发现,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像美国和韩国那样,维持已有贸易关系的较高生存度,这些国家就能够获得更高的出口增长。Besedes et al. 的最大贡献在于检验了微观产品层面的出口增长如何影响宏观层面的出口增长。

出口增长的波动性一直被经济学家所关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提供了分析该问题的新视角,该理论认为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有助于理解一国贸易增长的波动性。比如, Bernard et al. (2009) 发现,贸易伙伴间的进出口波动在长期主要取决于出口广度,而短期内则主要受出口深度制约。

(三) 对出口价格指数或贸易条件的影响

鉴于贸易条件对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之福利具有重大影响,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都非常关注一国贸易条件的动态变化,从中获取有关本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福利改善或恶化之信息,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把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与贸易条件联系起来的文献较为稀缺。

Kang (2009) 指出,传统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出口广度,导致低估出口价格指数。现代贸易理论将产品多样性加入模型,从理论上推出经济增长较快国家,其出口往往也较快,但是该国的贸易条件却并不会恶化。Kang 发现,由于没有考虑出口广度,导致韩国出口价格指数被低估89.3%。

Kang 的研究提示我们,对于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下降是否存在高估,进而贸易条件恶化是否被高估都需要重新思考,因为已有关于中国贸易条件的研究忽视了出口广度。

(四)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 Feenstra (1994) 之方法, Funke et al.

(2001) 首先对产品种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发现各国相对于美国的出口产品种类多样化指数与各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Funke et al. (2003) 还发现东欧各转型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出口产品种类多样化指数之大小能够解释各国相对于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高低。

参考文献:

- Amiti & Freund(2008), "An anatomy of China's trade growth", Working Paper, prepared for NBER Conference.
- Amurgo & Pierola (2008), "Pattern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World Bank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473.
- Andersson, M. (2007), "Entry costs and adjustments on the extensive: An analysis of how familiarity breeds exports", CESIS Working Paper No. 81.
- Bernasconi, C. (2009), "New evidence for the linder hypothesis and the two extensive margins of trade", Working Paper.
- Bernard, Jensen, Redding & Schott (2009), "The margins of U. S. trad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4662.
- Brenton & Richard (2007), "Watching more than the discovery channel: Export cycles and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ment", WB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302.
- Chaney, T. (2008),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4): 1707-1721.
- Corsetti, Martin & Pesenti (2008), "Varieties and imbalances: The extensive margins of the current account adjust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3795.
- Debaere & Mostashari(2007), "Do tariffs matter for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 empirical analysis", CEPR Working Paper.
- Debaere & Mostashari(2009), "What determines the exten-

- sive margi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king Paper.
- Eaton, Kortum & Kramarz (2004), "An anat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 New York University, Mimeo.
- Feenstra, R. (1994), "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1): 157-177.
- Feenstra & Kee (2003), "On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 variety in trad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3213.
- Feenstra & Kee (2008), "Export variety and country productivity: Estimating the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with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4(2): 500-518.
- Feenstra & Kee (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xport variety: A comparison of Mexico and China", The World Economy 30(1): 5-21.
- Felbermayr & Kohler (2006), "Exploring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world trade",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2(4): 642-674.
- Felbermayr & Kohler (2009), "WTO membership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of world trade: New evidence", Working Paper.
- Helpman, Melitz & Rubinstein (2008), "Estimating trade flows: 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2): 441-487.
- Kang, K. (2009), "The export price index with the effect of variety and an empirical analysis", Economic Modelling 26: 385-391.
- Mukerji, P. (2009),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xtensive margin",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56(2): 141-166.

(作者单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简皓)

(接 152 页) 继续深化公有制经济改革, 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都要实现全民所有、全民共享这一根本目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佳飞博士认为, 提高劳动者待遇将是后危机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持久动力。我国大多数企业长期依靠低工资维持生存, 在微观主体上缺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内在动力。世界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为我国重新整合生产要素、提高劳动者待遇、实现产业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因此, 要全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 适时上调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标准。第二, 继续落实劳动合同法并且监督执行。第三, 通过多种渠道提高普通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待遇。

中共中央党校王天义教授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我们经历了由片面追求数量规模到注重质量效益的转变。从发展是硬道理转向科学发展观具有不同的侧重点: 前者侧重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特别是 GDP 的增长速度, 而后者则侧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 而只有通过居民消费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 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是扩大居民消费。要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上保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香伶)